

暖水屯上的多聲部

——重讀《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 程文超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直被稱讚為反映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重要作品。這無疑指出了作品思想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也只是「一個」重要方面。其實，它還包含了其他被人忽略的主題。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直被稱讚為反映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重要作品。這無疑指出了作品思想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在對土地改革故事的敘述裏，其實還隱藏着一個知識份子改造的主題。如果說，前者的故事是其顯文本的話，那麼，後者的故事則是其潛文本。

我以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對土地改革故事的敘述裏，隱藏着一個知識份子改造的主題。作品通過土地改革的過程寫了一個知識份子的改造過程。如果說，前者的故事是其顯文本的話，那麼，後者的故事則是其潛文本。在對這個潛文本的書寫中，作者於知識份子改造這一問題上的情感與思緒，從意識層面到潛意識層面，都自覺不自覺的流入了筆端。今天讀來，這些流露都精彩得令人心酸。讓我們看看作品的人物設置和情節安排。在這部作品中大致說來有四類人。第一類為土地改革者，第二類為被改革者。前者是僱農、貧下中農

等農民，後者是地主。他們的共同特徵是與土地打交道的人，是這場「土地改革」中的利益相關者：要麼獲得，要麼失去。在「土地改革」這場戲中，他們是不同性質的主角。另外兩類人不同。第三類人是幫助改革者，第四類人是破壞改革者。這兩類人都不是直接與土地打交道的人，他們的具體利益都不與這個村子的土改發生直接關係。有意思的是，這兩類人，作者都給知識份子安排了表演空間。這正是我想討論的。

讓我們先看第三類人物。作者在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中安排了一個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以幫助村子裏的土地改革。這並沒有甚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這個工作組的組長文采安排為一個知識份子，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識份子。「據他向人說他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或者更高一些，一個大學教授。」看來他屬於大知識份子。作者專門給他取名「文采」，並這樣描寫他：「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樣，生得頗有風度，有某些地方很像個學者的樣子，這是說可以使人覺得出是一

個有學問的人，是賦有一種近於紳士階級的風味。」作為大知識份子，文采當然有許多知識份子的毛病。參加革命後，他到了延安，提高了不少，也誠心要到群眾中去向老百姓學習。於是，他成了暖水屯土地改革工作組組長。一到農民中，文采那知識份子的毛病就充分暴露出來了——他高傲虛榮，看不起同組的另外兩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他以知識份子的眼光去判斷農民，一到暖水屯，對人的觀察便頻頻錯位。比如一見支部書記張裕民，只憑張裕民「敞開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和身上的汗氣和酒味，就判斷這人「曾有一個短時期的流氓習氣」。他不了解農民，也不了解農村的工作方式，一派知識份子的腔調。第一次開土改動員會，面對農民，他一口氣作了六個小時的報告，滿口「現代名詞」，全是空理論與大套話。農民們聽得睡意朦朧，文采卻還陶醉在自己「詳盡透辟」的講演之中。更嚴重的是，他不了解農村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地主錢文貴是暖水屯上的一大霸。在地主的勢力中，他是傀儡戲的提線人。他不被鬥倒，暖水屯的土地改革根本就不可能進行。但錢文貴是一個十分狡猾的地主。文采一直被假象迷住，不把錢文貴作為鬥爭對象。還有，文采不理解農民的階級感情和鬥爭熱情。當群眾中的烈火燒起來後，文采時時與政策本本的條文對照，怕群眾搞過火了、搞左了，因而往往擋在群眾前進的路上。

這樣的一個知識份子被作者挑來作土改工作組組長，暖水屯的土改故事就出現了某些戲劇性：表面上文采是土地改革的領導者，實際上卻成了運動的阻礙者；表面上他是來幫助運動的，實際上，只有在他被幫助、被

改造之後，運動才能推進。於是，作品便出現了別有深意的情節安排：推動情節進展的「結」不是鬥倒了地主或是揪出了壞人，而是解決文采的思想認識問題。作品實際上是圍繞文采的認識轉變和思想改造來安排整個內在的、核心的故事結構的。文采帶領工作組進村，作六個小時的報告而沒有涉及到實質性的問題，工作無法開展。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一次「工作需要」，將文采調到另一個村子裏去工作了一小段時間。工作隊另兩名成員楊亮和胡立功從調查入手、配合村幹部逐步發動群眾，工作才開始有了起色。文采回來後，在幹部的工作和群眾的熱情中，思想和認識開始了轉變。「果樹園鬧騰起來了」一節既是運動的一個轉折，也是文采思想的一個轉折。

然而，因為錢文貴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群眾在果園裏已經燃起的鬥爭火焰終於熄滅。文采不僅不能帶領群眾鬥爭錢文貴，而且對張裕民等基層幹部不信任。運動陷入了僵局。這時，靠暖水屯現有的力量已經無法改變文采了，於是作者派來了章品。章品了解農村、了解群眾，處理問題老練乾脆。他一涉過桑乾河，很快便了解了暖水屯的情況，迅速作出了符合貧苦農民心願的決策。對章品的做法和指導思想，文采並不是一開始就心服口服的。但章品能巧妙地說服文采，使他「釋然」、使他改變看法，主動配合工作，於是暖水屯的土地改革迅速推向了高潮。文采他們也很快完成了任務，離開了暖水屯。

在作品中，作為工農幹部的章品，顯然是黨的化身。作者給他安排的身份是宣傳部長，這便使他成為一個懂得知識份子、有能力改造知識份

文采不了解農民，也不了解農村的工作方式，一派知識份子的腔調。這樣的一個知識份子被作者挑來作土改工作組組長，暖水屯的土改故事就出現了某些戲劇性：表面上文采是土地改革的領導者，實際上卻成了運動的阻礙者。於是，作品實際上是圍繞文采的認識轉變和思想改造來安排整個內在的、核心的故事結構的。

子的黨的幹部。表面看來，他在作品中只出現一次，並不是作品重點塑造的人物。但是在作者的心目中，他卻是舉足輕重的。在1948年9月東北印行的版本前言中，作者只提到過作品中的一個人物，這就是章品。在1949年為俄譯本寫的前言中，作者再次提到章品。可見這是作者十分重視的形象。他的出現，是文采轉變的關鍵。

二

再看第四類人物：土地改革的破壞者。任國忠畢業於鄉村師範，是暖水屯唯一稱得上「知識份子」的人。當然他也不是暖水屯的人，只是學校畢業後到這裏教書的。他與暖水屯土地改革並無具體利害關係，但卻奇怪地跑出來反對土地改革，上竄下跳，搞了許多具體的破壞。然而，任國忠破壞土改也並不真的奇怪。他雖然在土改中並無經濟利益變化，但他是知識份子，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與農民、共產黨、八路軍一條心；他看不起沒文化的人，抱怨「如今又是武人世界，穿長褂子的人吃不開了」；他對共產黨一肚子不滿：「共產黨總是說為窮人，為人民，這也不過只是些好聽的名詞，錢二叔，你沒有去張家口看一看，哼，你說那些好房子誰住着？汽車誰坐的？大飯店門口是誰在進進出出？肥了的還不是他們自己？」

這確實是一個並不光彩的角色。但有意思的是，對這樣一個破壞者，作者並沒有把他劃為敵人，而是由章品把他帶去進行改造。這裏，章品與群眾有這樣一段對話：群眾中有人說：「咱早就說這傢伙不是好人，鬼鬼

崇崇盡在有錢人屁股後邊跑，也不知忙些甚麼？」又有人問：「把他扣到縣上去？」章品只笑着問：「你們看這人怎麼樣？」大家答：「誰還看不出，他把墨水吃到肚子裏去了，一身透黑。」「年輕人嘛！咱們想法教育，還教不過來？咱帶他回縣上入教育訓練班去，把他腦子改造好再給你們送回來，這才免得誤了你們的子弟。」章品說完便往外走。對「一身透黑」的人，章品還是要教育、改造，可見章品對知識份子有着極大的寬容。看來，作者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和章品改造知識份子的力量寄予了極大的希望。

三

丁玲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十分敏感。在延安，丁玲因工作關係曾與毛澤東有一段很密切的交往，因而很早便領會毛關於知識份子到工農中去的精神。據丁玲回憶，1937年春，毛澤東在她的住處遇見一群從國統區來延安的抗大學生。他笑着對丁玲說：「丁玲，我看這些知識份子很喜歡同你接近，你這裏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丁玲說：「我懂得他是在批評我，說我不能堅持深入工農兵。」「後來又有一次，毛主席說我是名士氣派，我懂得這個批評更重了，但心裏卻感到舒服，認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這個缺點。」^①

1942年，丁玲寫了《三八節有感》，在延安文藝整風中雖受到批評，但卻沒有受到王實味式的批判。為甚麼？這與毛澤東有關。1942年4月初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人們對《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等作品提出了批評。毛澤東在總結時說：「《三八節

據丁玲回憶，1937年春，毛澤東在她的住處遇見從國統區來延安的抗大學生。他笑着對丁玲說：「你這裏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丁玲說：「我懂得他是在批評我，說我不能堅持深入工農兵。」「後來又有一次，毛主席說我是名士氣派，我懂得這個批評更重了，但心裏卻感到舒服，認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這個缺點。」

四

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回憶這一段之後，丁玲說：「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②這「感激」，成為丁玲的一個「情結」，從此她更注意到工農中去，一直想以努力改造「立場和思想方法」來報答毛主席。後來，丁玲寫了《田保霖》，受到毛澤東的表揚。毛澤東在一次高幹會上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丁玲感慨的說^③：

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為我的《田保霖》寫得沒有甚麼好，我從來沒有認為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這是毛主席在鼓勵我，為我今後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他這一句話可以幫助我，使我通行無阻，他是為我今後寫文、作人，為文藝工作，給我們鋪一條平坦寬廣的路。

於是，到工農中去、完成知識份子的改造，成為丁玲心中最重要、最神聖的事業，成為她畢生為之奮鬥的使命。她說，她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時候身體不好，生活很苦，但她「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着毛主席，想着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想着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④。而她之所以要呈獻給毛主席，除了因為此書是寫土改之外，我以為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向主席匯報她關於知識份子到工農中去改造思想、感情的思考。這是丁玲通過土地改革書寫知識份子改造故事的最隱密的心靈流露。

當然，這一「心靈流露」又是豐富的。就是說，它不只有「改造」的內容。作為一名知識份子，丁玲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有着深刻的認識，但對改造的前景，她又本能的有着警惕——儘管這警惕是微妙的、不易覺察的。於是，我們看到，她在寫文采需要改造的同時，又下意識地為文采作些自己未必意識到的辯護。文采確有知識份子的毛病，但他主觀上並不是一個壞人。他有着很高的革命熱情，認真鑽研革命理論，着力研究革命問題，有到群眾中去向老百姓學習的誠心，對自己身上的毛病也不是頑固不化。有時候，他的擔心也並不完全是知識份子的毛病，比如，取江世榮地契之前，文采導演了事前練兵。他維妙維肖地模仿地主，幫助農民提高與地主鬥爭的膽量和技巧，減少了衝動和盲目性，保證這場鬥爭順利地取得勝利。這裏，文采的表現是精采的。總之在作者筆下，文采是一個本質不壞，又能夠接受改造的知識份子。

一般論者都把文采作為「諷刺形象」。這不錯，但不全面。我以為，作者塑造這個形象的用心是良苦的。實際上，她希望這個形象有兩種功能。第一種功能可以說是「諷」、是「刺」，這當然是善意的諷刺。它是知識份子的一面鏡子，幫助知識份子照見自己，以促進自己的改造。第二種功能則是「喻」、是「諫」。作者要通過這一形象告訴人民、告訴黨，知識份子願意接受改造，也是能夠被改造的。她希望黨不要把知識份子當成敵人。這一點，丁玲在給《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俄譯本寫的前言裏有過明確的表述，她說^⑤：

1942年，丁玲寫了《三八節有感》，在延安文藝整風中雖受到批評，但卻沒有受到王實味式的批判。為甚麼？這與毛澤東有關。丁玲說：「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這「感激」，成為丁玲的一個「情結」，從此她更注意到工農中去，一直想以努力改造「立場和思想方法」來報答毛主席。這是丁玲通過土地改革書寫知識份子改造故事的最隱密的心靈流露。

在描寫文采的同時，我也竭力使人們相信，像他這樣的人，只要認識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並得到了改造，他們是能夠也應該成為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而鬥爭的真正的戰士的。

這就使作品在一個人物身上出現了兩個聲音，既批評，又辯護。儘管辯護是小心翼翼的、聲音細小的，但在內心的份量並不輕。丁玲曾揣摸過毛澤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她說◎：

毛主席統率革命大軍，創業惟艱，需要知識份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這群人的弱點，缺點，從個人角度可能他並不喜歡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識份子，需要有才華的人。他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和這些人交朋友，幫助這些人靠近無產階級，把原有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立場，自覺地徹底地轉變過來。

在心中最隱秘的層面，丁玲害怕黨和人民對知識份子失去了信心，害怕知識份子接受了改造之後仍然被黨拋棄。不少論者將文采當作無足輕重的人物，看來是有所失誤的。文采這個人物所要承載的任務，重得幾乎令人同情！

五

除了知識份子問題這一聲部之外，《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還有另外一個聲部：女性問題。女性解放是丁玲早期創作的重要主題，她塑造了一系列爭取解放的知識女性，著名的有莎菲女士。20年代初，她曾接觸過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這對她的早期思

想與創作頗有影響。據丁玲回憶，20年代末，她因幾篇小說出名之後，一次一家書店請客，說他們要出一期「女作家」專號，約請一些有名氣的女作家寫稿，希望丁玲也寫一篇，「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長短，稿酬從優，而且可以預支」。丁玲當即拒絕，並說：「我賣稿子，不賣『女』字。」丁玲沒有因為她被視為著名女作家而高興，她之所以要把「女」字單獨提出來，「那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還存在婦女問題，婦女還沒有取得同男子一樣的平等的地位」⑦。所以，那時丁玲的筆一直講着「女性」、「個性」、「解放」的故事。30年代以後，丁玲的創作出現了轉變，主題逐漸從個性解放轉向了革命。但女性解放問題卻已在她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時時自覺不自覺地在其文字裏流露出來，《三八節有感》便是這種流露之一。這篇文章差點讓她闖了大禍。其實對她來說，這只不過是因為三八節而觸動了她的女性主義的神經，藉此借題發一通女性主義的感慨。她當時還不太成熟，還不能在一根神經興奮時也考慮到另一根神經，因而政治敏感性在無意識中鬆懈了。她在寫文章時也許壓根沒想到這些文字會揭露了延安的問題。她寫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說點「女人」的話，而不是想說點「延安」的話。也就是說，她這時主要的考慮是男人女人的問題，而不是延安西安的問題。於是她一開篇就接上了20年代「不賣『女』字」時的問題：「『婦女』這兩個字，將在甚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這種提問方式是十分女性主義的。今天讀來，在40年代的延安出現用這種方式的提問，多少有些令人吃驚。用這種方式提問的文章，自然為女人說話◎：

女性解放是丁玲早期創作的重要主題。據丁玲回憶，20年代末，她因幾篇小說出名之後，一次一家書店請客，說他們要出一期「女作家」專號，約請丁玲寫稿。丁玲當即拒絕，並說：「我賣稿子，不賣『女』字。」

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與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奮鬥或捲入庸俗)。

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裏，丁玲心靈深層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再次浮了出來，它表現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黑妮儘管是一個農村姑娘，但身上卻有着莎菲們的基因——她敢於追求自己的愛、自己的幸福。她愛上了家裏的長工程仁，就不顧門第、不顧一切地大膽愛着。這愛情被錢文貴發現後自然遭到反對。為拆開這一對戀人，錢文貴辭退了程仁，但這並不能破壞黑妮心中的愛。作者着力寫了在他們的愛情受挫之後黑妮對程仁的一腔真情。黑妮愛程仁不只是为了要得到他，還表現在對程仁事業的支持上。後來，八路軍來了，暖水屯解放了，程仁當上了農會主任。為了在新社會中再當不倒翁，錢文貴這時又極力主張黑妮與程仁恢復戀愛關係。他讓全家人輪流對黑妮進行攻心戰，但黑妮就是不上圈套。儘管她深深地愛着程仁，但卻知道不能因為自己而影響程仁的工作。在黑妮與程仁的愛情上，黑妮比程仁要可愛得多。程仁當了農會主任以後，便害怕與黑妮來往了。「他很怕因為這種關係影響了他現有的地位，群眾會說他閒話」，因而有意疏遠黑妮。黑妮知道這一點，她承受着愛的煎熬，理解着程仁的苦衷，諒解着程仁的行為。這是一位敢於自己給自己當家、自己给自己做主，敢於也有力

量承擔自己的選擇的、深明大義、堅韌不屈的女性。她的尋求個性解放之路並不比莎菲輕鬆，更不比莎菲遜色。

六

在知識份子的問題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文本裏既有着談知識份子改造又有為知識份子辯護的兩種聲音的對話；同樣，在女性解放問題上，作者內心也有着走個性解放之路與階級解放之路的對話。這些對話透露了作者潛意識裏的某些東西，但在意識層面，作者又清醒地讓這些對話走向了「階級」話語。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手稿裏，黑妮是錢文貴的女兒，但在發表本裏，則改變為錢文貴的侄女。這一改，人物的階級關係變了，但黑妮能夠去愛程仁的某些基礎，如富有同情心、愛勞動等品質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為甚麼要這麼改呢？丁玲曾作過解釋◎：

書沒寫完，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了批評：說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農民家裏怎麼髒，地主家裏女孩子很漂亮，就會同情地主、富農。這話可能是對一般作家講的，但我覺得每句話都衝着我。我想：是呀！我寫的農民家裏是很髒，地主家裏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涌又是個「富農」，我寫他還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惱。於是，不寫了，放下筆再去參加土改。

這是修改黑妮身份的直接原因。經此一改，人物就不只是在階級身份上發生了變化，更在內涵上出現了微妙而深刻的不同。

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手稿裏，黑妮是錢文貴的女兒，但在發表本裏，則改變為錢文貴的侄女。這一改，使黑妮與程仁的愛多了一層階級反抗的色彩：她與程仁同是被壓迫者，他們的愛是被壓迫者心心相印的愛。於是，我們在黑妮的愛情上就看到了這樣的微妙：既能感受到女性的反抗，又能感受到階級的反抗。

丁玲這一代知識份子懷着為民族尋求光明與解放的「總主題」走向了階級論，誠心接受無產階級的階級改造，並同無產階級一起走進了新生的共和國。她們應該是為無產階級所歡迎的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了吧？然而，不幸的是，丁玲對知識份子改造最隱秘的擔心卻終於直接發生在她自己身上。

當黑妮是地主的女兒時，她愛程仁的行為，完全是一個女人的個性解放的行為：她不顧階級差別、不顧門第不同、不顧父母反對，堅決要嫁給一個窮苦農民；作為女人，她要替自己作主，為自己安排一生；她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人必須三從四德以及被安排的命運。而當黑妮只是錢文貴的侄女時，她與程仁的愛儘管仍然是自己作主，卻多了一層階級反抗的色彩：她與程仁同是被壓迫者，他們的愛是被壓迫者心心相印的愛。作者寫道，黑妮五歲就死了父親，跟着二伯父錢文貴過日子，「伯父伯母都並不喜歡她，卻願意養着她，把她當一個丫環使喚，還希望在她身上撈回一筆錢呢，因為這妮兒從小就長的不錯，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黑妮在家裏與伯父伯母、堂姐堂兄的關係都不好，因而，黑妮與錢文貴家既不分享經濟，也不分享感情與思想——她只是地主家的一個借住者，一個變相的丫頭。她在婚姻問題上對錢文貴的反抗，就成為一個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反抗。於是，我們便看到，當程仁到錢文貴家打長工後，在家中得不到溫暖的黑妮很自然就與程仁成了朋友。他們由相互同情到友誼、再由友誼到愛的歷程，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也因此，黑妮後來不中錢文貴的圈套等等，都屬於階級反抗性質的行為。

於是，我們在黑妮的愛情上就看到了這樣的微妙：既能感受到女性的反抗，又能感受到階級的反抗。而在總體上，卻是階級的反抗。在土改之外的兩個聲部上，丁玲都有着心靈的對話，但她最終都讓心靈的對話服從了理智的結論。《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出了丁玲當時內心的複雜與豐富，也寫出了她當時堅定不移的選擇。丁

玲這一代知識份子懷着為民族尋求光明與解放的「總主題」走向了階級論，誠心接受無產階級的階級改造，並同無產階級一起走進了新生的共和國。她們應該是為無產階級所歡迎的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了吧？然而，不幸的是，丁玲對知識份子改造最隱秘的擔心卻終於直接發生在她自己身上。1955年，她被打成「丁陳反黨小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又被劃為「丁馮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年，她再次受到批判，後來更被開除黨籍、取消待遇、查禁作品，下放北大荒勞動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關進秦城監獄，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也終於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

註釋

- ①③⑥ 丁玲：〈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丁玲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頁179；180；181。
- ②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同上書，頁175。
- ④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重印前言〉，同上書，頁20。
- ⑤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俄譯本前言〉，同上書，頁15。
- ⑦ 丁玲：〈寫給女青年作者〉，同上書，頁427。
- ⑧ 丁玲：〈三八節有感〉，《丁玲文集》，第四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⑨ 丁玲：《生活、思想與人物》，同註①書，頁341。

程文超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